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eio Associated Repository of Academic resouces

Title	於蕭紅対女性覚醒的彷徨
Sub Title	Awakening of women seen through the life and literature of Xiao Hong
Author	林, 敏潔(Lin, Minjie)
Publisher	慶應義塾大学藝文学会
Publication year	1998
Jtitle	藝文研究 (The geibun-kenkyu : journal of arts and letters). Vol.74, (1998. 6) ,p.185(174)- 207(152)
JaLC DOI	
Abstract	
Notes	目次のタイトル : 蕭紅の文学と人生における女性の覚醒について
Genre	Journal Article
URL	https://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detail.php?koara_id=AN00072643-00740001-0207

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KOARA)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コンテンツの著作権は、それぞれの著作者、学会または出版社/発行者に帰属し、その権利は著作権法によって保護されています。引用にあたっては、著作権法を遵守してご利用ください。

The copyrights of content available on the KeiO Associated Repository of Academic resources (KOARA) belong to the respective authors, academic societies, or publishers/issuers, and these rights are protected by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When quoting the content, please follow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论萧红对女性觉醒的彷徨

林敏洁

时当草木荣华之龄却玉殒香消的萧红是三十年代颇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生于动乱的一九一一年。鲁迅曾赞誉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1]。然而她却红颜薄命，命里多劫，年仅三十一岁便过早地结束了她热爱而又憎恨的人生。

萧红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一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性。她的人生几乎经历了一个女人一生所可能遭遇到的所有苦难。她幼年丧母，作为女儿，她被父亲逐出家门，开除族籍，从此饱受流浪之苦并吞忍着男人的欺辱。初为人母，因生计所困，忍痛将婴儿送与他人。二度身怀六甲，又不幸夭折。作为妻子，她被丈夫认为是没有妻性的人并受婚变之苦。并忍受丈夫的暴力、移情和歧视。(这里包括她与萧军和端木蕻梁的两次婚姻纠葛)。她又生逢战乱，为了生存，从中国的最北端黑龙江开始流亡，先后辗转北京、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重庆、西安、广州、香港等地。

萧红的创作生涯前后不足十年，却是位拥有散文、小说、诗歌等百余篇的多产作家，其中以小说最为脍炙人口。在国内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书中，论及萧红早期的成名之作《生死场》者最多。但其研究、评判的视野都未越出现实主义文学的空间。而对《生死场》的评价也只局限抗

日救亡文学的现实主义范畴，而忽略了萧红作品中天然的人文主义倾向。

随着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消失了近四十年的萧红终于拂去了积压在她周身的封尘，和她的作品一起重新引起关注。“萧红现象”就在历史的觉悟中产生了。

这一历史性的轮回，并非少数专家们大发慈悲的结果。“萧红现象”是从一个侧面，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文艺理论的怀疑[2]；是对人文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的过程、影响以及起到的作用的再认识。于是，萧红这位以人文主义为立场，曾长久苦苦地思考过、探索过人的生存意义、女性的命运的女作家便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尊敬和瞩目，人们开始重新安排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排名榜。并由此产生了持续长久的“萧红热”。

近年来，对萧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研究的领域涵盖了如下课题：

一、对萧红生平的存疑部分的整体追踪和挖掘；

二、对萧红作品历史定义的探讨；

三、对萧红作品艺术特质的争辩；

四、对萧红个性特征与作品风格归属的讨论；

五、对萧红作品美学价值的评估分析；

六、对萧红后期作品创作动机及思想属性的审视判断；

七、对萧红主要作品的选择排列；

八、对萧红思想脉络变迁与其生存现实环境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纵观萧红的小说作品，令人感到非常吃惊的一个现象是：女作家的笔下描绘了大量的死亡。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属一个异例。众所周知，鲁迅可算是现代文学史上描写死最早、最多的作家之一。但鲁迅与萧红的区别在于：鲁迅描写死亡之意是对文化传统全面、整体的反思与批判；萧红描写死亡的基点是在对旧文化传统的全方位怀疑的前提下，承鲁迅的衣钵，更多、更具体地试图究明女性自身的历史命运。

笔者试图就萧红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之死进行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些人物，管窥萧红的创作动机、思想意识以及其变迁的过程。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对萧红研究的现况做一个概括。本论文的重点，欲求借助对萧红小说作品中女性人物之死的表象透视，发掘其内在实质、时代困惑及其困惑的历史属性与历史结局。从而试图证明萧红个人人生理念与创作理念超越时代的意识，并阐述因此种心灵世界的衍进而必然导致的现实世界的跌落以至绝望与毁灭。

一

萧红写于一九三三年的《王阿嫂之死》被公认为是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之死》写了一位丧夫后又惨遭地主暴力，早产而死的中年妇女。写于一九四一年的《小城三月》是萧红短暂生涯中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文中描写了一位女青年的死。萧红的小说创作可说是以女性的死开首和终结的。从《王阿嫂之死》到最后的《小城三月》女主人公翠姨之死上，我想可以窥见萧红思想的发展轨迹于一斑。

在此，我先将萧红小说中死亡群像做一简要的归纳：

作品	年代	人物	年龄	身份	死亡原因
《王阿嫂之死》	1933	小环的妈 王阿嫂	中年 中年	农村的寡妇 农村的寡妇	被地主的儿子强奸后气愤而死 丈夫被地主烧死后又遭地主的暴力，早产死
《哑老人》	1933	小岚	青年	女工	被女工头殴打而亡
《生死场》	1934 ～ 1935	小钟 月英 王婆 小金枝 女学生 冯丫头 麻婆子 菱花奶奶 菱花	3岁 少妇 老年 幼儿 青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3岁	农妇的幼女 农夫之妻 农妇 农民的幼女 学生 义勇军 农夫之妻 农妇 农民的幼女	母亲忙于农事时跌在铁犁上丧生 瘫痪后得不到丈夫照料而死 服毒自杀未遂 被贫困的父母摔死 被日军抓去后处死 当义勇军时战死 被日军杀害 因子被日军所杀绝望后悬梁自尽 被祖母在同一房梁上吊死
《呼兰河传》	1937 ～ 1940	小团圆媳妇 王大姑娘	12岁 青年	童养媳 碾官之妻	因不懂所谓"媳妇"规矩而受尽折磨，最后被按在热水缸里烫死 在草棚里产后死
《后花园》	1940	冯二成子的妈 老王	老年 中年	碾官的妈 碾官之妻	病死 产后两年死亡，原因不明
《小城三月》	1941	翠姨	青年	寡妇之女	"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纳闷"
《红玻璃的故事》	1943	王大妈	中年	贫妇	精神忧郁死

萧红前期小说中的女性死者主要死于暴力、折磨、贫困或战争，是黑暗社会旧势力和侵略者的直接牺牲品。作品中人物的死因大都一目了然。其叙述的手法亦格外鲜明、大胆、直接。有些描写死亡的情节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而后期小说中、即写于一九四〇年的作品《后花园》及绝笔之作《小城三月》，故事人物的死亡已明显有别于女作家的其他作品。尤其是《小城三月》中的翠姨之死，已不是简单地对一个悲剧故事中主人公个人命运的描述、亦非仅仅寄托女作家善良的同情与感伤。"不知为什么死，大家也都纳闷"[3]的陈述背后，已潜藏着作者令人深思的理念旨向。

新时期的萧红研究，对其早期作品的定位基本上已有成说，但对其后期作品的研究、评价，数年间呈现出众说不一，褒贬参差的局面。这一方面说明视点的移位、思维的更新给萧红研究带来的新气象、新机遇，同时也显露出萧红研究有待解决的诸项问题。

《小城三月》在萧红的小说作品研究中，长久以来或被轻视，或论说略有偏颇，或只谈作品含有的反封建婚姻意识。诸如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从整体上已难能可贵地对现代女性文学有了一个较为全面、客观、具体的分析，但就是这样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专著，对于《小城三月》亦将作品定位于反对封建婚姻的范畴之内[4]。

八十年代始，有数篇研究《小城三月》的文章问世。这些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们在文学理论上弃旧图新的苦闷与探索，有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功效。但仍然未能完全冲出自延安"文艺讲话"始、建国后、特

别是文革期间营造出的理论怪圈。

进入九十年代，后起之秀皇甫晓涛独具慧眼，率先用理性与激情，将思维的探索触角延伸向《小城三月》女主人翁翠姨的悲剧的心理因素和文化背景。试图通过揭示“东方女性”情感方式的历史负荷和对生命的压抑与摧残[5]。判断萧红的创作动机与创作理念，这为萧红研究进入的窘境，重新开辟出一条蹊径。但略感遗憾的是皇甫晓涛的努力宽度有余而稍嫌深度不足。

对于《小城三月》的探析，近年来有了个层面的开拓，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起步的基石，虽然研究的着眼点、审美尺度各有不同，但试图解明萧红这一特殊年代产生的作家所持有的特殊创作理念或思维个性旨向的努力却十分明显，至此更准确地把握萧红创作的内含实质便成为当今拓展所必须攀越的进阶与课题。

在《小城三月》中，原本在女作家笔下频频出现、紧连时代的表象描述已经隐没。在女作家灵魂深处经过长年苦难磨砺与冥思辩疑之后，在理念的桅杆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一道艺术屏幕上，一幅似乎永久静止亦或是在不断重复的画卷展示在历史昏暗的夜幕上，我们仿佛真切地聆听着一首东方女性在千百年的昏睡中夜梦初醒后的悲惋曲致、柔肠寸断的永恒的挽歌。而这首挽歌的主旋律已不再是怀春少女单单的哭泣、哀怨。

二

《小城三月》通过一位正在读书的少女，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寡妇家的女儿，名叫翠姨。翠姨是一个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的女子。她暗地里爱上了才华出众，正在读大学的地主家的儿子，即作品中“我”的堂哥哥。本是默守陈规的闺房女子终于在新文明的感召、呼唤下，下意识地蒙发出追求婚姻自主的欲望。这是女性觉醒过程中第一个鲜明的追求。而恰恰是这第一个恩泽于新文明的人性欲望，给女性带来盘根错节的困惑与无奈。

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却天资聪颖对新事物有着好奇心的翠姨，在订婚之后去哈尔滨置办嫁妆时，带着她采办嫁妆的向导是“我”的堂哥哥给她介绍来的同学。于是与翠姨日常所生活的愚昧乡村环境有天壤之别的新文明世界出现在她带着少许惊讶，又蕴藏几多兴奋的眼眸里。以往在“咸与维新”的“我”家，“我”的伯父家里听说并略有感受的新文明气象，成为翠姨眼见为实的亲身感受。

> 偏偏那带着她采办嫁妆的向导，又是哥哥介绍来的他的同学。他们住在哈尔滨的秦家岗上，风景绝佳，是洋人最多的地方。那男学生们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带来着哥哥介绍信，象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车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接过去了；她刚一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
> 不用说，买嫁妆她是不痛快的，但那几天，她总算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象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

经这到哈尔滨去一买嫁妆，翠姨就不愿意出嫁了。她一想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　　《小城三月》（萧红全集　pp693）

五四新文明的熏陶，又逢洋学堂“咸与维新”的新鲜空气的诱导、启发，翠姨渐渐不甘于再走妹妹那条村镇女性婚姻的老路。大都市的一次游历，使翠姨更加觉醒，这似乎应该带给她公开反抗过包办婚姻的决心和举措。但是恰恰相反，从城里回来之后，拿起书本的翠姨并没有从知识中获取更进一步抗争的力量，翠姨反倒变得“整天地闷闷不乐”，她开始潜心地思考了。结果是“翠姨后来支持不了啦，躺下了”。在出嫁之前悄然死去。

从翠姨的死，即作品的结局里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者萧红心怀悲哀地领悟到新文明赠给女性的第一个礼物，不是新生，而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困惑和新的绝望。

小说在描述翠姨去大城市哈尔滨买嫁妆的一开始，耐人寻味的使用了“偏偏”两个字。这里除了有意向读者传递着某种不祥的信息之外，同时也可窥见作者潜藏在文字背后对跨越历史时空条件的女性觉醒所产生的深刻不安。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特别注重这样一个现象，《小城三月》与萧红其他的作品中对“我”的家庭气氛，家庭成员的描写惯例大相径庭。往往在萧红的其他作品中，“我”的家庭环境总是昏暗、封闭、甚至是可怖的；

家庭中的成员. 如父亲、祖母、继母人人都笼罩着一幅阴森的面孔。例如她在《永远的憧憬与追求》的散文中提到自己的“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人性……”[6]；在《呼河兰传》中又如此描述道：

> 我家是荒凉的。
> 一进门. 靠着大门洞子的东壁是三间破房子. 靠着大门洞子的西壁仍是三间破房子。 《呼兰河传》（萧红全集 pp782）

而在《小城三月》中“我”的家庭. 初一读来却貌似十分祥和并充满“咸与维新”的文明气息。“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7]；如早年参加过“维新革命的父亲及开朗、通情达理的伯父. 慈祥又善解人意的继母（这位继母与小说中的“我”是仅有的两个猜测到翠姨在暗恋着“堂哥哥”的人物）；在景物上的描写也十分明显地突出着诸如“网球场”、“大正瑟”、“风琴”一类新文明的象征物……。

多年来. 许多评论家已注意到这些在景物描写与人物刻画上与其他作品的出入。但对其的解释却呈现着困惑不已的状态：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小城三月》中对景物的刻意描写反映出萧红对自己旧式家庭的依恋。并以此作为萧红后期思想“走下坡路”的佐证。另一部分研究者批评萧红美化了自己旧式的家庭。尾坂德司的《萧红传》中针对中国学者对《小城三月》所作的“美化家庭”之说.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其写作手法含有作家眷恋自己女子中学时代的情感成份. 从萧红的创作节奏来看.

当视为一种安慰自己苍凉孤苦生涯的休闲之笔[8]。

另外，研究《小城三月》的李重华则持另一种观点，将故事的情节背景极力解释为萧红少女时期真实的生活经历，其中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如父亲、继母、翠姨即真实生活中的家庭成员或远亲[9]。这一观点铁峰、黄甫晓涛亦持赞同态度。

以上诸研究者虽各持其说，各有见地。可是我认为这些评论仍有商榷补正的余地，要找到解开《小城三月》之谜的钥匙，触及问题的实质，似乎应当着眼于如何透过小说描写中的层层表象去探求作者真实的写作心态和警世喻人的良苦动机。

当然我们可以推断分析，一九四一年的萧红已是位成熟的作家，在她构思《小城三月》的情节及景物、人物时，已不象早年她与家庭决裂时，那样冲动。她很可能在对其家庭成员的人格判断上有所反思而更趋于客观、理智，但决不能证明这就完全是作者少女时代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

我认为这是萧红特意采用的写作手法，其真实意图非常值得推测：萧红是想借助一种表面的"咸与维新"的虚象，来反衬出人对人，尤其是人对女性的不理解。甚至让翠姨朝思暮想的"堂哥哥"亦全然不解她的心曲。当翠姨临死前想向那位读了大学、接受过新文明教育的"堂哥哥"诉说心意时，他却"不知道现在就该是保护翠姨的地位，还是保护自己的地位。"[10]即使那新文明的弄潮儿的"堂哥哥"，偶尔提起翠姨时虽然为她的死而"常常流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纳闷"。似乎谁也没有想过生命中是否应当有爱的存在，更不能理解女子在感情与婚姻

上该拥有的权利，与人性本能的欲望。于是被“咸与维新”的“春风”启迪了的翠姨，却可哀地成为“咸与维新”的牺牲者。

作品在这里通过引起翠姨几度巨大的心里变化的脉络叙述，用其细腻，巧妙的描写手法，涵盖了两种文化结构，风俗习惯，伦理尺度，并展示了它们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这大概就是萧红依照自己作为女性的觉醒者，“过来人”为那个时代的女性人生勒划出的一个结局。女作家在成熟后带有几分悲哀的冷静中，分明是在执著地探究女性觉醒后的出路这一历史命题。由愚昧走向觉醒，这正是萧红一贯的文学主张[11]。萧红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文学主张是可以从她几乎所有的小说中发现的。鲁迅在《呐喊》中寄托的就是呼吁人类从愚昧走向觉醒，萧红不仅是在创作上，而且是在各方面都接受了鲁迅的影响和关照的作家。在众多的青年作家中她被鲁迅另眼相待，说明她与鲁迅在思想意识上有着紧密的呼应和共鸣。鲁迅多次赞扬她恐怕也是源出于此。从萧红第一篇小说《王阿嫂之死》到一九四〇年的《呼兰河传》，基本上贯穿了这一求觉醒、反愚昧的主题。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对人生生存意义的不断思索和探求，但《小城三月》则似乎改弦更章、话里有话、弦外有音。

这篇萧红最后的小说作品，是在萧红贫病交加，从此倒下，两腿再也不能站立之后，躺在香港的病床上一气呵成的，只用了数天时间[12]。她一定在心中酝酿了很久但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当她意识到了她的反抗人生失败时，她已理智地找到了故事的结尾，“我要在父亲面前彻彻

底底地投降了……”[13] 正告诉人们萧红已悟出了自己的结局。

这篇文章的含义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对着人类的愚昧，不是为了表现，也不是为了呼吁人们由愚昧走向觉醒，而是在于表现由觉醒走向困惑、苦闷，再由苦闷走向毁灭这个由历史衍进所导致的女性“死亡之谷”。小说中的翠姨的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作品中对代表着新文明的“春天”所抱有的半喜半忧的心情，在《小城三月》的一开头部分便有绝妙的吐露：“春来了”[14]。作者格外醒目地渲染这一主体气氛。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经历隆冬折磨，在“春”的召唤下渐渐苏醒的农村小镇。这里自然界的“春”分明暗示着新文明时代的到来，久受旧文化窒息的人们“象久久地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可见人们在迫切的期待。然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明明是对美好“春”的神往、呼应，偏偏大家都有“犯罪”的意识，这便把旧文化对人们鬼使神差般的束缚，新文明对人们本性的启迪所造成的矛盾暴露无遗。翠姨显然是这新旧文化对立中的牺牲者。她越是熏染上新生活的气息，就越是不愿回到旧生活中去。然而她无力冲破挣脱无形中缠绕着她周身的旧宗法之网。她在感受到“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蛊惑”之后郁闷而死。

“春”对她而言、是幸中的不幸，还是不幸中之幸？“春”的脚步“好像无论什么地方都在招呼它[15]”，但春却来去匆匆，令人难以细心领略。春似乎责任重大，公务紧迫，若是这春“在什么地方稍稍留连了一下”的话，“就会误了不少生命”。而这留不住的春光，给享受过它的人带来

的是更多的烦恼与不安，翠姨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世界中的弱女子。小城三月的春风，正是这矛盾的外在因素。而她觉醒后深感不安、不满的灵魂则是内在因素。

这就向人们道出了一个极其令人深思的问题，觉醒是否对女性有着起“死”回生的功效，觉醒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可能加重了精神的折磨，加快了毁灭。

以上就是我所把握到的《小城三月》之主题，我认为萧红自己本人对觉醒产生了不安，亦可以说是对觉醒产生的彷徨，谓之绝望亦不过份。鲁迅在编完小说集《呐喊》之后，他对觉醒同样产生了不安，于是他继《呐喊》再出版了《彷徨》。或许是萧红与鲁迅心有灵犀，自觉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她把本是早已可以写作的女性婚姻题材，一直迟迟拖延酝酿到自己的生命衰弱之际、才一气呵成。可以说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的萧红，用她生命的残蜡之火，写下《小城三月》的绝唱。

三

在萧红去世的第二年，她临终前口述的《红玻璃的故事》由骆宾基整理发表出来了。但这一作品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甚至可以说几乎是无人问津的状态。然而我认为这篇文章已充分明显地表现出了萧红生涯最后的心境与创作动机。

原本生活得滋滋有味，快活开朗的王大妈，却因外孙女生日的那一天，

偶然看了一眼万花筒之后，便突然象是恶梦初醒，对人生红尘看破。

> 王大妈失神的那瞬间，想起什么来了呢？想起她自己的童年时代，也曾玩过这红玻璃的花筒，那时她是真纯的一个愉快而幸福的孩子；想起小达儿她娘的孩子时代，同样曾玩儿过红玻璃花筒，同样走上她作母亲的寂寞而无欢乐的道路，现在小达儿是第三代了，又是玩儿着红玻璃花筒，王大妈觉得她还是逃不出这条可怕的命运的道路吗？——出嫁，丈夫到黑河去挖金子，留下她来过这孤独的一生？谁知道，什么时候，丈夫挖到金子，谁知道什么时候作老婆的能不守空房？
>
> 这些是王大妈从来没有仔细想的2，现在想起来开始觉得是这样孤独，她过的生活是这样可怕，她奇怪自己是终究怎么度过这许多岁月的呢！而没有为了柴米愁死，没有为了孤独忧郁死！
>
> 《红玻璃的故事》　（萧红全集 pp888）

在这里的万花筒即《小城三月》中春的隐喻。春没有改变女性的命运。王大妈由对命运的、人的本能的生存的抗争，转而产生对生命意义的悲观，导致对生活的厌倦、不满。她意识到人们只是在祖先决定的生活准则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调寂寞，无所追求地生活着。在对人生的觉醒的同时，王大妈的生命之火便宜随之熄灭了。

萧红的《小城三月》与《红玻璃的故事》虽然两篇作品内容不同、但已同出于一种思维根源，即对人生价值及女性的生存意义的怀疑，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彷徨。

经历了近十年的生活磨难、精神苦旅，萧红已是位饱经沧桑而又深思熟虑的写作老手。而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与她息息相关的女性人物，一定要流露出她思想深处的蛛丝马迹。纵览萧红的一生及作品，她对于女性解放的初期认识，其间陷入的苦闷境地，以至最终导向绝望状态的漩窝，似乎有着一条清晰的曲线。

早年她怀着对女性独立的追求，大胆毅然地向父权挑战，冲出了家门，投向她心目中充满自由的天空，但社会残酷的现实，折断了她天真得过份的幻想之翼。在产期将近、负债累累，险些被卖进妓院的危境中，一位拔刀相助的萧军，出现在她的身旁，于是她有了稍可躲藏身心的避风港。在短暂的热恋之后，她却痛苦的发现用自由换来的爱情婚姻又使她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自由。她在有独立有人格的女作家与附属性的家庭小主妇的双向轨道上，驾驶不了一辆机车。（实际上就是现代女性的职业妇女与家庭主妇角色冲突的问题）她厌烦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不满萧军对她的作品的不理解与品头论足，于是她要挣脱从属的地位，尤其是在两人之间出现了第三者之后。恰在此时，战乱的契机又使她遇到了端木，虽然端木是个"胆小鬼、势力鬼、马屁鬼"[16]，但在萧红眼中起码端木不那么大男子主义了，他们作为人（夫妻）彼此的地位平等了。而这仅从表面满足了萧红追求自强、自立、自重的心理。

《萧红自集诗稿》和《萧红书简》是萧红的两部自传体作品，是她自我心灵的写照与抒发。其中情诗《春曲》六首，失恋诗《苦杯》十一首以及旅居日本时写的《沙粒》三十五首，既能显示女作家特有的气质与个

性，又能证明萧红等一代冲出家门的“娜拉”们共同面临的生活现实冲突与心理矛盾。

二、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冲刷着古老的大地。新旧道德观念的相互抗衡、相互碰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引起着巨大的震动和冲突。萧红便是出生成长在这一大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一位追求女子个性解放、为女性不幸的命运呐喊的作家。

当时有知识的女性普遍怀有的乞盼便是通过对婚姻自主的追求踏上女性自我实现的人生第一个台阶。幻想着借助此台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萧红的个性又是极为敏感的，因此她自然有着比常人更强烈、更深刻的内心苦闷与痛苦：

什么最痛苦，

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沙粒》三十四　萧红全集

这是萧红早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首诗，无需旁证博引，该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萧红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白马王子，因此萧红发出：“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沙粒》二十）的感叹。萧红在梦醒后发现：“我本一无所恋，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诅咒这烦乱的情绪，“好像诅咒恶魔那么诅咒。”（《沙粒》三十三）。又似自问自答地悲叹到：

此刻若问 我什么最可怕？

我说：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　　《沙粒》二十七　萧红全集

梦醒后的萧红感到最可怕的是女性被压抑了很久后复苏了的爱情。没有爱情的春藤缠绕的人生是荒芜可怕的. 有了爱的意识. 情窦初开、却更为痛苦。这就是萧红的爱情意识上的纠葛。

同样在一九三七年萧红曾在一篇貌似评述战争时事的散文《失眠之夜》之中. 亦流露出她对女性自身命运的担忧与遐想。萧红认为远离故土的飘流、为人之妻的苦衷皆为对女性自我实现的追求所付出的现实代价. 于是不由地流露出种种悲怨情感所造成的心灵孤独与担忧：

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我想着这样说了。

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 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

而我呢？坐在驴子上. 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 我停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　　《失眠之夜》(萧红全集　pp1059)

一九三八年在萧红唯一的评论文（《大地的女儿 》和《动乱时代》）之中. 明确地显示出萧红已开始有意识地论及着觉醒这一主题了. 但字里行间隐约浮动着在"觉醒"面前呈现出的思路上的紊乱无绪。本想说服别人的一篇文章却流露出作者本人杂乱无章的纷飞思绪。而今天我们看来这恰恰是萧红"觉醒"的人生旅途中不断思考探索的必然过程。此篇

文章的思路虽不算清晰，文笔亦没有过多的褒奖之处，但却为我们留下追踪萧红“觉醒”全路程中一个沉重而又轮廓模糊的脚印。

而作于一九四一年的《小城三月》虽然通篇没有使用“觉醒”这两个文字，但萧红对女性觉醒后的归宿已有了彻悟。纵观《小城三月》中翠姨的形象，她也是在新文明的熏陶下觉醒过的女性，虽然面对传统因袭，作品中的翠姨被现实生活中的萧红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抗争手段。翠姨仅仅是在个人内心世界苦斗，萧红却惊天动地地大有作为了一番，但却殊途同归，两人都走进了女性解放的死胡同。鲁迅曾将封建社会畸形的文化母体比做封闭的“密室”。萧红可谓身临其境、感触颇深的一位女性体验者。在这“密室”的窒息里、抗争与妥协都没有出路。女性觉醒后的兴奋后最终被陷入迷津的困惑所代替。萧红在惶惶不安中发出了对女性解放以至女性的生存的担忧及对新文明势单力薄的感慨。

于是新的更大的怨愤和不安、强烈地震撼、侵袭着身心交瘁、贫病交加的萧红。她一定更深切地感到“女性的天空是低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17)。这便是萧红一生心路的最形象的写照。

以上就是萧红作为一名女性解放的先驱者多难而矛盾的一生。作为被压迫、被欺辱的女性的代言人，萧红有着不可名状的长远而深沉的痛苦与反思。而萧红的个性特质，又决定了她不断地在挣扎中沉沦，在沉沦中挣扎，这在客观上给她提供了为总结人生而苦思冥想的机会，使她对觉醒后的女性命运有了彻悟。尽管结论是悲观的却亦是那个时代的客观事实。

四

通过对萧红的小说《小城三月》为中心的女性人物之死的分析、探究及对萧红的人生进行的考察，首先发现到她对女性的生存意义的不断探求。作为有着很高灵性的作家萧红，随着对女性命运的不断探求、思考，对人的本能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在她用她的生活行动及手下的笔进行了近十年的轰轰烈烈的反抗之后渐渐脱离了冲动的人群，开拓步入了一条无人所知、孤寂无援、清冷荒僻的从《呐喊》转向《彷徨》的孤独旅程，在这路上行走的萧红是痛苦的，但却渐渐理智、冷静起来。她的思惟领域已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年代的风风雨雨的日常现象，她又从探索人的生命意义的当中，特别地探索着女性的觉醒这一主题。在这里、她逐渐产生了不安、彷徨乃至最后完全悲观失望了。可以说她历史性地走进了死胡同，象鲁迅先生预料的那样"梦醒了无路可走"。成了那个时代只能塑造成的一个失落的"娜拉"，这是历史给她安排的不可选择的角色。也象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以调侃的口吻形容的那样："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走到哪里去呢？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18]。理想的海市蜃楼，代替不了每日的柴米油盐。

在萧红小说中，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女性人物之死的分析，发现她对帝国主义、封建的阶级制度的揭露与批判。萧红也曾用过这种表现方式去发泄过她对女性命运的无限感慨。但萧红的后期创作意识却有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萧红最后的小说《小城三月》的女主人公之死。我认为她

早在四、五十年前已认识到只凭对社会阶级的构造的改革是不能完全改变女性的历史命运的。

《小城三月》似乎是又在提示着人们，在人的意识还不可以从旧传统社会文化的束缚中完全脱离出来时，觉醒也将可能会成为促成精神夭折的一种催化剂。这是因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即使社会已改革，也不可能很快就能排除、摆脱传统的因袭对人们心理的束缚。

在经历多年外在的生活磨难与内在的思想的演变冲突中，萧红被几重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矛盾所困惑。她认识到了女性自我解放的过程中，除去客观现实的阻力之外，来自女性自身主观世界的“惰性”也是强大的天敌。女性的“惰性”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即使觉醒后腾飞的女性，她们的躯体中不可避免地遗留着历史的血缘细胞。萧红痛苦地意识到一生不懈追求“自我实现”的她，本身亦有着根除不去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便是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思维方式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女性作为人的自我实现与自我牺牲这两者的对立，便形成了女性心理上、历史性的盘根错节的状态。

通过研究分析萧红对女性命运的思考过程，我认为她在文学中的人生探索是深沉的，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女性（包括女性作家）可以说她觉醒的意识是超前的。所以始终伴随萦绕在她心底的痛苦便显得更加的沉重并无法解脱。她时而是坚定的，时而是彷徨的；时而充满自信，时而深感回天无术。我们从她的生命轨迹和创作流线上往往看到的是这样一位萧红：即旧礼教的叛逆者，新女性的探索者；觉醒过程中的奋进，觉醒后的

忧郁；对女性自我人格独立的向往、对男性世界缠绵的依赖；要保护、但反对束缚；求安全、但厌弃平庸；对新人生的渴望，对旧情意的追思……在如此种种难以调解、盘根错节的多元矛盾之中，她的觉醒使她获得了自由，但这自由使她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于是她闪着诱人光芒的思想的羽翼在时代的风雨中折断了，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愤恨、伤感、苦楚与不安，她匆匆离开了人间，留给人们一个沉重的轮廓。

萧红作为一个女作家，她游离于时代边缘的意识使她脱离了以党派斗争为历史背景的各种团体，这也是她曾经被轻视遗忘的原因之一。而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后，八十年代后期的妇女回家论，以及如今九十年代女性的种种困惑都表明萧红研究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今天重新理解她，意味着人们对女性解放的过程、方式将可以做出合理客观的认识和选择。萧红这个迟到的研究课题的真正意义也在于此。

萧红在时代变革急流里的几度沉浮、似乎象征着传统与未来两个天秤对一个灵魂的衡量。她困惑的一切均引伸出我对传统的遐思：无论是萧红小说中女主人公翠姨的死亦或现实生活中萧红的死都证明个体的“觉醒”与群体“密室”的冲突下，个体往往是悲怨而无奈的牺牲者。

所谓传统应该可认为是运动着的一个文化实体。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传统的流变一般是较平缓、温和的。当时代的步伐跌入历史规律性的急流，在对已知的文化气氛的厌倦与叛逆中、在对未知文化景象的神往与期盼中，处在新旧文化势力相驱逐的缝隙之间的开拓者，往往最终无奈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心绪与理念上跨越时代的悲哀者，而这种悲哀的

本身，从历史的意义来看便已经是对其时代最可贵的贡献，同时也给后人留下其时代思惟整体演变过程的清晰轮廓与典型凭证。因此我可以说萧红即这样一位悲哀者，同时也是一位开拓者。萧红的“跌落”后流出的思想“血液”直接衔接着新旧文化的“两代父子”。这“两代父子”虽在文化理念上有势如水火之处但却凝结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与难解难分的百年恩怨。分析萧红的“跌落”、“下坡路”现象如不将视点放在这一历史情结上，就很容易做出主观片面的判断和评价。

注：

(1) 季金香〈小女儿心态与大作家才情〉《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12月p226引载 斯诺于《活的中国：中国当代小说选》(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附录A・p348

(2) 四二年的“文艺讲话”之后的几十年里，歌颂光明，描写阶级斗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唯一的出路，为政治服务成了文学的使命。“三突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无产阶级世界观、突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长期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意识，它以“一花独放”的特权，称露文坛直到文革结束。

(3)《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5月p696

(4) 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p260

(5) 黄甫晓涛《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8月p93～107

(6)《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5月p1043

(7)《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5月p685

(8) 尾坂德司『萧红传』燎原书店 1983年1月 p304～305

(9) 李重华〈《小城三月〉的思想性与人物形象来源漫谈》〉《萧红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编辑部编 北方论丛第四辑 p 186～196

(10)《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1991 年 5 月 p 696

(11)〈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七月》1937 年第 7 期

(12) 丁言昭《萧红传》江苏出版社 1995 年 p 262

(13) 骆宾基《萧红小传》建文书店 1947 p 99

(14) 春来了。人人象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 今天夜里就要举行. 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 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 带着呼唤. 带着蛊惑 …… 同注(6) p 676

(15) 春. 好像它不知道有多么忙迫. 好像无论什么地方都在招呼它。假若它晚到一刻. 太阳会变色的. 大地会干成石头. 尤其是树木. 那真是好像在多一刻工夫也不能忍耐。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留(流)连了一下. 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同注(6) p 697~698

(16) 聂绀弩《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 p 209

(17)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 倒是怯懦. 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 我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 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 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同注（16） p 207

(18) 刘思谦〈关于中国女性文学〉《文学评论》1993 年 2 p 61 引载于〈走！走到楼上去〉《张爱玲散文全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p 88